

一九四三年英美的欧洲战略
与开辟第二战场问题

张 京

中南民族学院历史系
一九八五年二月

一九四三年英美的欧洲战略 与开辟第二战场问题

英美横渡英吉利海峡，于法国北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和现代军事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英美联军配合苏联红军在欧洲东部的强大攻势，在西线打通德国法西斯的心脏地带，迫使德国法西斯腹背受敌，是战胜这个战争原凶的重大战役。从苏联参战到1944年D日，开辟第二战场问题始终是影响苏英美关系的重大因素，在三国战时关系中留下了丰富的记载和值得借鉴的经验。尤其是当1943年初二战战略转折出现后，面对英美政府1942年在第二战场问题上许下的诺言，似乎开辟第二战场指日可待了。实际并不如此。目前，我国史学界研究该问题的注意力多在1941、1942年间第二战场为何未能建立方面，本文试图从战略角度就1943年英美开辟第二战场作一点粗线的探讨，说明1943年依然是开辟第二战场整个问题发展的重要阶段，以就教于同志们。

1942年底至1943年初，同盟国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包围了德国精锐部队第六集团军，并在顿河河曲地带重创德仆从军，击败德曼斯坦因救援行动后，第六集团军已成为瓮中之鳖。这是德国法西斯开战以来遭到的最沉重打击。美军在南太平洋瓜达卡纳尔岛战役中经过浴血奋战，消灭了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战场上的突击力量，刹住了它的进攻势头，使太平洋战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北非战场上，随着“捷足”、“火炬”战役的展开，

英军结束了与德意法西斯近四年的拉锯战，联合美军将敌人赶到了突尼斯沿海一线。英美军方人士此时“第一次感到有了胜利的希望。”二战进入了战略相峙阶段。1943年初，英美军政首脑在北非卡萨布兰卡召开最高会议，研究未来战略计划。会议对1943年双方军事行动的决议却远不如他们军事上已取得的胜利那样激动人心。尤其就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作出的含糊其词的决议，不仅引起了斯大林极大的不满，就连美军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也感到过意不去。

实际上，英美的决议，恰好是他们对战略形势转折认识的反应。

在西欧实施横渡海峡、开辟第二战场战役，不论在英方或美方的全局战略中，都属于战略性质战役。他们要求该战役给予德国“一次直接的毁灭性的打击”或“最后一击”，结束欧洲战场战斗。这次战役总的作战方针在客观上同斯大林从东线吸引30—40个德国师，减轻红军压力的要求和吻合。从而产生了三方在战略上相互配合的可能性。开辟第二战场计划中，以军事行动直接援助俄国，特别是在苏联危机的时刻提供紧急支援，始终居于从属地位^①。这种行动，英美是以小规模突击性战术计划安排的，如曾计划1942年9月实施的“痛击”战役。

英美针对军事形势和自身的战略设想，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对1943年行动作出下列决定：向苏联运送补给品，解决航运安全问题，结束北非战斗被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在欧洲战场与德意法西斯实质性的遭遇战，除要排7月份发动西西里战役外，无其他明确计划。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仅强调继续在英国集结部队，成立独立的最高联合参谋部。当斯大林追问开辟第二战场具体日期时，丘吉尔、罗斯福联名答复为1943年8—9月。从会议过程和英美的私下安排来看，他们的这种答复，如果说不是欺骗，至少也属于“夸大性的、不负责任

的回答”②。他们这里所指的，实际上是1942年“痛击”战役的翻版，更名“阿连德”的行动③。该行动的目的是应付可能出现的德国崩溃突变局势。这种答复即在表面上暂时稳定了斯大林的情绪，使他不至于完全失望，维持了同盟关系；又在实际上为应变作了准备。一旦德国国内形势因苏德战场战局发展而产生突变，英美也不至于猝不及防，可以及时地发现在欧洲大陆，尽可能占据有利态势，不给苏联留下争夺胜利果实的把柄。从卡萨布兰卡会议决议可见，尽管英美都希望反法西斯战争向前发展，他们在主观上却不抱十分积极的态度。从反映在英这个时期行动上的突出特点是，对欧洲军事计划缺乏明确的战略方向。英美两国意见有分歧，美国内部意见也不统一。对于第二战场问题，虽然双方基本认为在1943年按原订规模实施几无希望，但考虑到难以预测的形势变化和对苏关系，谁也不敢直言相告。他们担心自食其言会激怒斯大林，造成自己行动上的被动，增加舆论上的压力。这种暧昧的态度与美国3月旧金山太平洋军事会议作出的两路出击、夹击日本法西斯战略决策形成鲜明对照④。

一般讲，战争的原则是最有效地保存自己、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两者间有着辩证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多边组合的全球规模战争中，从战略上理解这个原则有着它不同于一般双边战争的特殊含义。此刻，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包含着主动式与被动式两层意思。所谓主动式，即以自己的人力、物力为基础，主动攻击敌人，达到某种预期的战略意图；所谓被动式，即假他人之手，借助别人之人力、物力，消灭共同之敌人。两种方式选择的出发点，其一是针对当前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敌人，其二是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赢得战争的胜利。在苏英美战时同盟中，由于主客观上存在三方各自的利益和两种制度的矛盾，使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按照二战期间特殊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

战争原则制定战略方针。因此，当战争发展到战略相峙阶段时，鉴于开辟第二战场战役在英美总体战略规划中的地位，他们在这种时刻是不会给予苏联明确答复的。只有当新的战略转机出现后，他们才会对此作出准确答复。从当时情况分析，1943年欧洲战场的转折必需取决于：苏德战场形势的发展，红军转入战略反攻；北非战役的最后结局，开辟第二战场必须抽调英美北非部队。虽然马歇尔曾预计1942年底该地区战斗可望结束，事实上跨过年关后这里仍然炮声隆隆，而且德军还在不断地从欧洲调来增援部队；太平洋战场的牵制因素。美军必须在太平洋战场保持一定力量，这点始终同英美欧洲联合行动相扰。经济因素。1943年初英美战时生产还未达到最高峰。在尽力扩大生产能力、兼顾各战场需求同时，还必须对敌人的经济力量实施打击。这种经济消耗战与破坏战将促进战略形势变化。四点中苏德战场局势发展又居首要地位。

因此，我们认为英美1943年初的战略安排，反映了他们对战略形势的认识；他们对开辟第二战场问题给斯大林的答复常有不诚实色彩。由于只顾自身利益，他们不愿为开辟第二战场承担更多的义务。这是二战特殊的战争原则的客观反映。

对于英美推迟第二战场开辟时间，斯大林在致丘吉尔、罗斯福的信中指出，这种作法是“危险的”。抱怨由于英美在北非战场停滞不前，缺乏第二战场，导致德国一再从西欧抽调部队到东线，给苏联造成极大的困难。斯大林在公开场合说道，“鉴于在欧洲没有第二战场，红军独自肩负着战争的全部重担”^⑤。与此同时，苏联方面连续作出几件令西方感到担忧的事情。苏方“一直加紧迫使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接受1941年的波苏边界和由此而引起的东部领土丧失”，

“同捷克进行战后联盟对话；支持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机构；在南斯拉

夫游击队同切特尼瓦斯进行的内战中支持南斯拉夫游击队”⑥。并在卡廷事件后与伦敦波兰流亡政府断交，在苏联建立了波兰左翼流亡政府。

苏联这些带有极大的独立性，并可能直接影响战后欧洲格局的行动引起西方的不安。因为它们伴随着苏联在东方的胜利和对西方的警告作出的。为了维持战时三国合作关系，平息斯大林因第二战场问题产生的愤怒，英美对上述事件非但未以还击，相反，还准备对斯大林的某些要求让步。1943年3月下旬，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访美期间，罗斯福就苏波边界和波罗的海三国问题同艾登交换了意见。双方基本同意苏联战后将控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仅欲以此“作为讨价还价的手段以获得俄国在其他方面的让步”⑦。波苏边界问题，罗斯福也倾向以德国领土作为交换条件，使波方同意让出寇松线以东领土，满足苏方欲望。对4月发生的卡廷事件，英方压制了波兰流亡政府试图组织国际红十字会调查的要求，美方也积极出面调停，希望两家言归于好⑧。

由此可见，英美此时已经准备违背自己拟定的《大西洋宪章》，以牺牲小国利益，满足苏联的某些非法领土要求来缓和因第二战场问题造成的三国关系恶化。这些今天已经成为事实的领土变更，不能不说是二战期间三国在反法西斯联盟中留下的污点。

鉴于英美军在北非的进展，在欧洲展开的战略轰炸，两国政府作出的政治姿态和苏德战场的相对平静，苏联同英美之间逐渐地消除了由于第二战场问题引起的不愉快因素。5月，斯大林在公开场合赞扬了西方的军事胜利和物资援助⑨，解散了共产国际，热情接待了罗斯福的特使，表示赞同与罗斯福举行最高级会晤⑩，三国之间的紧张气氛得到明显缓和，达到1943年三方关系融洽的第一个高潮。分析

它的原因，这是因为英美在政治上作出的某些让步，成为^为缓和三方关系的最佳综合剂。

二

1943年5月，英美在华盛顿召开了代号“三叉戟”的双边最高级会议。会议决议表明，英美在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上再度食言。苏联方面对此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这一年的夏季，成为1943年英美与苏联关系最冷淡的阶段。因为战略意图分歧，英美双方关系也一度极为紧张。

“三叉戟”会议召开前，对第二战场问题的认识，英美内部已经取得一致：鉴于半年来欧洲战场及整个形势的发展，本年度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因此，“三叉戟”会议上决定西^西里战役后英美联军矛头所向成为英美讨论的主题。

会议期间，英方一再要求西^西里战役后立即进军意大利和巴尔干地区，这样即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约盟国的资源，又可以从巴尔干地区打入一支楔子，从南部伸入欧洲心脏地带，与红军在中欧会师。同时，在军事政治压力下，有可能将土耳其拉入战时联盟，直接威胁轴心国南翼。对英国的这个方案，美方每个人都很清楚其中的秘诀何在。会议前，美国诸战略研究机构都曾详尽地分析过英国的地中海战略。美国陆军参谋部作战计划处认为，“英国的地中海主张，是其消耗战略的组成部分。他们打算动摇德国和俄国，以便保持欧洲力量的均势。通过控制伊拉克和伊朗来加强和巩固大英帝国在印度、中东及非洲地区的残存部分。由于到那些国家的主要路线要经过土耳其，所以将它拖入战争，在东地中海发动一个巨大的攻势，能防止某些来自欧洲的侵袭”^①。5月3日，美国联合战略研究委员会也得出相同的结论。

英帝国的参谋长们和丘吉尔试图通过二战，完成对帝国生命线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薄弱环节——地中海东北岸自意大利到土耳其一线——的控制。无怪罗斯福在同他儿子的谈话中奚落丘吉尔，“是一个维持现状的伟大人物”，“他的最大任务是使英国安全地渡过这次战争”^②。

对于英国的立场，美方表示反对。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就曾表示，“他们（指英国）绝对不能再以为我们与他们的联盟是单纯地为了要帮助他们坚持其古老的、中世纪的帝国观念”^③。美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帝国主义国家，从根本上反对丘吉尔极力维护的这种陈腐的旧殖民主义观念。这与它以自由贸易为先导的新殖民主义政策是格格不入的。因此，美国不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去维护这个没落的帝国体系。在美国的战略布局上，虽说其实力远远超越英国，但因它同时在两个主要战场作战，所以还必须注意协调与盟友利益发生的冲突。罗斯福权衡美英、美苏和美国内部三种关系的地位宗旨是尽可能地满足美国战时及战后利益的要求。何时以何者为主则依据战争进程而决定。1943年上半年，在战时物资逐渐充足的情况下，陆军方面以马歇尔为代表，一再要求落实欧洲战略计划。而占美国国内公众舆论54%的人要求把美军军事打击重心放在太平洋战场^④，这点大大地加强了海军关于给予太平洋更多关注要求的地位。英方则要求美国保持既定的“先欧后亚”战略原则，尤其此时英国在欧洲战场的兵力还暂时超过美国，美方感到不便破坏双方谁投入兵力多，就应当较多地照顾谁的意见的不成文法。加上美国陆军观点与英方要求在地域上的一致性，罗斯福更不能弃之不顾。这样，美国三军统帅罗斯福陷入了矛盾极为复杂的境地：即要维持“先欧后亚”原则，又要尽量关心太平洋战场；即要维护同英国的盟友关系，又要反对英方消耗战

略，即要与英国协调战略方针，又要考虑与苏联的关系问题。听凭英国消耗战略发展，拖延开辟法国北部战场，不仅会推迟欧洲战场战争结束，过多地耗费美国的人力、资源，而且将导致与苏联关系紧张，破坏美国得到苏联在对日作战中给予配合的战略设想。不难看出，此刻对战略方向和第二战场问题的抉择与美国二战中的整体利益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

“三叉戟”会议上，罗斯福使出浑身解数，极力地平衡、协调几者关系，使会议的决议成为美国及美国^英陆海军的要求都得到某种照顾，但都不满意的妥协决议。会议同意西^西里战役后随即攻入意大利，但对细节未作任何安排，并规定，地中海地区凡超越西^西里、意大利一线、使用联合部队的战役，均需通过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批准。决议指明西^西里战役完成后将七个师部队调回英国本土，作为横渡海峡部队之一部。决议明确规定1944年5月1日将发动横渡海峡战役，开辟第二战场；1943年8月1日前完成行动计划草案^⑮。太平洋战场方面，会议原则上同意发动“^安海纳吉姆”战役。会议决议使英国和美国陆海军的要求都部分得以实现。最重要的是阻止了英国将行动扩展到东地中海的企图，给予第二战场开辟以具体的保证，从而使美国实施横渡海峡战役在诸方因素允许的范围内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证，为确保美方战略意图实现奠定了基础。无怪丘吉尔认为，“总统……自始至终……支配和影响参谋长联合会议的讨论过程”^⑯。会议唯独对曾向苏联作出的允诺弃之不顾，再度改变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那么，当时情况是不是象罗斯福、丘吉尔在6月份给斯大林答复中强调的那样，英美还存在许多困难，年内开辟第二战场条件仍不成熟呢？

如果谈困难，任何军队实施数十万人参加，诸兵种合成大规模两栖登陆战都会不同程度存在，条件成熟与否也是相对的。可是从英美

实际情况看来，特别是从1943年夏季战略情况分析，我们可以说英美已经具备了1943年下半年开辟第二战场的能力。英美答复斯大林的托词，只能反映他们在主观意识上不愿过早地开辟第二战场，有意进行拖延。大西洋航运困难和登陆艇数量不足是英美首脑强调最多的两项困难，事实并不如此。德国海军司令邓尼茨在回忆录中写道：1943年5月后德国潜艇战对英美海上运输已经失去威胁，英美先进的反潜手段使德国潜艇的损失大大地超过了补充水平^{①⑦}。英国史学家也认为，1943年5至7月同盟国成功地挫败了德国持续数年的潜艇攻势，商船建造的数量已超过被击沉的数量^{①⑧}。1943年7月西西里战役中，英美联合部队在帕塞罗角和利卡塔地区登陆场上，共使用了近1,840艘登陆舰艇，供八个师同时在八个登陆点提供了条件。与诺曼底战役比较，前者的登陆点还多于后者，并且“其规模之大甚至超过了十一个月以后同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①⑨}。罗斯福在致斯大林的信中也承认“若干大型登陆艇已必要地被派遣到西南太平洋，阿留申群岛和地中海”^{②⑩}。缺乏登陆船支，航运安全问题不能成为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条件不成熟的理由。随着英美战略轰炸步骤，欧洲战场的制空权也转到同盟国一方。战争初期德国法西斯享有的空中优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②⑪}。战时生产方面，仅美国的重装备生产能力就大大地超过了德国的同类武器生产水平^{②②}。英美战时生产在1943年下半年均达到高峰，可以为渡海战役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我们认为条件不成熟说理由并不充分。1943年第二战场未能开辟的主要原因是英美决策者认为战略形势尚未成熟。西西里战役预定在7月进行，结束之时也无法预料，因此他们不希望过多地牺牲自己的利益，有意拖延时间。只要德国法西斯在欧洲未对英美造成致命威胁，特别是当自己的战时盟友、未来的潜在敌人——苏联，

仍在其本土与德国法西斯厮杀时，英美是不会改变战略，全力援助苏联，作与自己战略安排相违之事的。法国二战史学家米歇尔形象地描写了英美的这种作法：“他们对输赢的分量控制得不多不少，刚刚使俄国人不至于窒息，又不能真正强大起来”。因此，在“三叉戟”会议召开前，罗斯福就开始琢磨如何就第二战场这个最棘手的问题答复斯大林。他十分清楚，再度拖延开辟第二战场会激怒斯大林，导致同盟国之间关系恶化，而阶级利益又决定他不能、也不愿意改变现行方针。所以，他极希望通过单独会晤斯大林，解释英美在开辟第二战场问题立场上的差异，求得苏方的谅解，维持三国关系，为今后在太平洋合作留下余地。

斯大林对英美背信弃义的行为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和愤怒。在斯大林6月给罗斯福、丘吉尔的信函中，他以十分严厉的措词指责了英美这种行径。7月初，苏联召回了它驻伦敦和华盛顿的大使。当英美拒绝苏联代表视察北非地区时，莫斯科抨击了英美在该地区的政策。在欧洲，苏联再次重复了他们对波罗的海三国的要求，加强了同波兰人和捷克人的联系^{②③}。斯大林还取消了同罗斯福会晤的安排。尤其令西方不安的是，在库尔斯克战役转入反攻的时刻，自由德国委员会在苏联宣告成立，英美将其视为战后德国政权的雏形。对罗斯福请求苏联准许空袭罗马尼亚油田的盟军飞机在苏紧急着陆的要求，苏方也迟迟不与答复^{②④}，舍伍德在回忆苏美关系极为紧张的这段历史时写道，“幸而希特勒不知道当时盟国之间的关系坏到这等地步，已经到了破裂的边缘，而这正是他得救的唯一希望所在”^{②⑤}。

在库尔斯克战役的炮声和苏联对英美的谴责声中，西西里战役拉开了帷幕。地中海战役进行得异常顺利，欧洲形势发展势头也颇为可观，下一步怎样走，又一次向伦敦和华盛顿的核心人物提出，带着胜

利的消息，也带着与苏联关系日益冷淡的气氛，英美首脑终于走到魁北克会议桌旁。

三

魁北克会议召开时，反法西斯战争三大主要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更重大的变化。

苏德战场上，红军从7月13日开始的反击攻势久盛不衰，德军数千公里防线上被相继拉开几个大缺口，收复被德国法西斯占领的土地开始成为现实。在地中海，英美联合部队夺取了西西里岛，攻入意大利即刻可成为事实。尤其在墨索里尼被废黜，意大利前途面临新的选择之时刻，英美对这个地区给予了更大的关注。太平洋上，美军经过年中新乔治岛登陆战的总结，毅然采取了新作战方针——越岛战术，决定用砍断日军某些串联环节、孤立某些岛屿的方法，节约有生力量，加快反攻进程。对韦拉拉韦拉岛的战斗，标志着这种战术开始实施。这时，战略反攻已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旋律。

当胜利的曙光呈现在地平线上时，英美对下一步的战略安排考虑更复杂了。胜利的概念对三方来说含义是不同的。魁北克会议前盟军西西里战役结束后的欧洲战略意图不大明确。根据1943年5月华盛顿会议安排，艾森豪威尔的任务是制订“使意大利退出战争”的计划。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批准以前，他无权实施这个计划^②。面对红军的大举反攻和苏联对欧洲的关注，必须阻止苏联深入欧洲腹地，防止欧洲布尔什维克化，在战后和谈中取得有利地位的要求在英美军政要员头脑中日盛一日。但如何实现这个目的，双方的立场是不同的。英国此时的意图基本未变，仍希望攻入意大利，发动巴尔干战役，从东南欧地区进入中欧，阻止苏联可能的渗透。此刻美国既要考虑迅速

打败德国法西斯，结束欧洲战场战斗，得到苏联的许诺，在太平洋共同打击日本，又要顾及如何有效地制止苏联在欧洲的扩张，防止中欧布尔什维克化。英美原来存在的战略问题上的分歧并未解决，加进各自战后利益因素后，使魁北克会议笼罩着一层紧张空气。

会议期间，丘吉尔抓住墨索里尼内阁倒台和8月4日意大利向盟国提出希望退出战争的要求，一再强调：（一）意大利的局面给盟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年内不应让英美军一味地等待“霸王”计划的实施而无事可干。（二）如果及时地在意大利本土登陆，可以达到敲掉轴心国三足鼎立之势，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之目的。丘吉尔极力鼓吹地中海行动的目的就是贩卖他的巴尔干方案。他多次在会议上强调巴尔干战役的重要性，认为在德国两翼插上这一刀后，不仅可以配合1944年的横渡海峡战役，而且英美部队能够及时地进入中欧，防止苏联占领这个地区，在战后建立由它控制的政府。并且盟军舰队可以开进两海峡地区，使苏联在土耳其问题上不能妄动。丘吉尔甚至私下表示，如果美方不同意巴尔干方案，英国将依靠自己在这个地区的力量单独行动^{②①}。为了扩大地中海行动，丘吉尔提出应当适当考虑由此可能造成的对开辟第二战场时间的影响，动用按计划调离地中海地区，参加“霸王”战役的7个师兵力、装备和登陆艇。

对英国的这一揽子计划，美国当权人物及应是不一致的。总的看，他们都认为不能让英国在地中海东部任意扩大军事行动，破坏美国的战略意图。以金为首的海军方面在魁北克会议前就明确表示，“英方既然对‘霸王’战役始终缺乏诚意，我们应当放弃该计划，把物资都用在対日作战中”^{②②}。陆军方面不赞同海军的提案，他们主张除坚决阻止英国在巴尔干采取行动，按计划调集兵力，实施“霸王”战役准备工作外，应当对英盟施加压力，使其明白，这种“无限期地拖延战期

战争和相应地明显施延打击日本人”和作法是十分危险的。结果可能导致美国转向太平洋。罗斯福在内部会议上表示赞同陆军的做法，但考虑到意大利出现的有利形势以及意大利投降后从心理上对轴心国的打击，他感到应当同意英方要求实施的意大利本土登陆战。原则上，“霸王”计划压倒意大利行动方案。在三边关系中不能因为过多地照顾英国人而得罪苏联以致丧失自己的利益。必须在太平洋得到苏联的配合，这是此刻同苏联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⑤。而且，在德国出现崩溃迹象时，只有横渡英吉利海峡才能投入大量的部队，有效地阻止苏联对欧洲的控制，保证美国在和平会议上处于有利态势。巴尔干地区地理条件决定了英美不可能集中大量兵力和重装备去击败德国、阻止苏联^⑥。罗斯福坚决反对巴尔干战役，表示如果英方在此问题上一意孤行，美国战略不应是放弃，而是单独实施“霸王”战役^⑦。

双方的意见分歧使魁北克会议一度陷入僵局。西西里战役结束和意大利当局8月16日送来的请降信息^⑧迫使英美必须对未来行动作出决断。在美国转向的压力下，英国最终同意放弃巴尔干计划，对“霸王”行动提出保留意见。双方一致同意立即发动意大利本土登陆战。“霸王”行动的详细计划经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审议批准，战役实施的具体时间、地点、规模得以确认^⑨。显然，美国的意见明显占着上风。随后，英美建议与苏联召开三国首脑会议的要求得到苏方实质性的答复，三国日渐增加的紧张关系自华盛顿会议后第一次缓和。

但是英美战略问题上的分歧并没有随着魁北克会议闭幕消失。会后，英方不惜冒险对多德卡尼斯群岛发动了进攻。到1943年9月底，三营英军分别占领了科孚、勒罗斯和萨摩斯三岛。另一些小规模的分遣队在若干小岛登陆。仅从英国抽调中东驻军，由中东战区总司令指挥这次行动就可见它对东地中海地区的渴望和固执^⑩。战斗开

始尚顺利，但是由于缺乏后备兵力和运载工具，德军组织空降反击，形势逐渐恶化。10月，丘吉尔致电罗斯福，试图以既成事实求得增援。罗斯福拒绝了他的要求，指出增援的来源“不可避免地是意大利，‘霸王’计划或者是蒙巴顿的两栖部队这几方向，因此我的想法是……对任何次要目的采取的行动，不应当影响‘霸王’作战计划的成功”^⑤。结果，英军占领的岛屿得而复失。

1943年11月底开始的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在斯大林面前又老调重弹。斯大林拒绝考虑这种要求，罗斯福也未在巴尔干问题上给予丘吉尔任何支持。丘吉尔的意图再度破产。当着斯大林的面，英美肯定了开辟第二战场的具体事宜。这个问题引起的三方争议到此方算最后了结。公众舆论面前，罗斯福似乎在德黑兰会议上站在斯大林一边反对丘吉尔。实际上，了解了美国的战略意图就很容易理解罗斯福的立场了。

纵观1943年英美战略可见，双方在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上的态度是消极的。它们自食其言，一再背弃对苏联的许诺，一再拖延开辟第二战场，是它们不愿过多地牺牲自己利益的表现。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二战期间反法西斯同盟内部存在着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和三国不同的根本利益。战争越临近胜利，这些矛盾的发展越趋向激烈。在战争形势、各自利益和两种制度矛盾影响下，英美1943年欧洲战略演变呈现出阶段性。第一阶段的突出特点为英美战略方向不明，观望倾向明显。第二阶段英美下决心拖延开辟第二战场，各自为自己谋求更多的既得利益。因此双方在战略方向上争议分歧较大。当欧洲战局进入反攻阶段，英美决定1944年开辟第二战场，这个阶段里，英美战略意图中已经明显地加入了防止苏联和

社会主义在欧洲发展的因素·每一阶段中，英美态度、立场都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本质上无好坏之分，仅仅是它们各自利益要求的反应·

一九八五年二月

注 释：

- ① (美)罗伯特·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
第102页
- ② (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
1932—1945》第445页
- ③ (英)马克·斯多勒：《第二战场的政治》
伦敦版 1977年 第76页
- ④ (美)威尔特·邓恩：《1943年的第二战场》
美国版 1980年 第37页
- ⑤ (美)威廉·麦克及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
作与冲突1941—1946》第426页
- ⑥ 同③ 第36页
- ⑦ 同② 第569页
- ⑧ (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第四卷 第1121页
- ⑨ 《斯大林文选》第341页
- ⑩ 同③ 第102页
- ⑪ 同③ 第81页

- ⑫ (美)埃利奥·罗斯福:《见闻秘录》第67页
- ⑬ 同⑫ 第113页
- ⑭ 同⑬ 第82页
- ⑮ (英)乔治·布鲁斯:《当日的第二战场——通向D日的道路》伦敦版 1979年 第121页
- ⑯ 同⑫ 第564页
- ⑰ (德)卡尔·邓尼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海军战略》第14页
- ⑱ (英)利德尔·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册 第542页
- ⑲ 同⑱ 下册 第64页
- ⑳ 苏联外交档案:《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二卷 第67页
- ㉑ 《罗斯福遗集》第395页
- ㉒ (法)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下册 第46、135页
- ㉓ 同③ 第104页
- ㉔ (美)艾夫里尔·哈里曼:《特使》第240页
- ㉕ 同① 第369页
- ㉖ 同⑥ 第446页
- ㉗ 同④ 第40页
- ㉘ 同③ 第102页
- ㉙ 同① 第388页
- ㉚ 同③ 第120页
- ㉛ 同③ 第110页